

第八节 中外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经济交流的中心。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方剂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往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由于历史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例外医药交流的问题。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学生来我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寮，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为教材，招收留学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课程，显然是仿照中国医学教育而施行的。

中医的医学典籍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陆续传入新罗。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刘梦得文集》载有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事，此也可见朝鲜政府对中国医学之重视。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老师方”。《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唐高宗元年中，高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遇一新罗僧见之，以一药可活，但不知此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可见朝鲜医学在7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瘰疬（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P.137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医学的重视和信任。

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朝鲜药材也较多见载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载有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国图志》载有的附子等。此外，《海东绎史》卷26中载有新罗产药材土瓜、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楠、桃、榛子、膻肭脐等。

由上可见，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中朝两国医药相互交流之盛况。

二、中日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国派来留学僧人，将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来唐，其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小野妹子回国后，将《四海类聚方》三百卷以归（松尾东洋《皇汉医学沿革之展望》P10，《皇汉医学丛书》第十四册，1936年），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3年回国，携带有《诸病源候论》等书。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7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三次来中国深造。

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捭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名目，如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圣德太子遗物送到“正仓院”。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均藏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如疾

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针灸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上述这些明显具有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

除派遣留学生如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集验方》等书而成的。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达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这些书籍是通过日本来我国的使节、僧人、留学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带去的，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三、中越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在越南传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

在中越互相交往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通商相互赠礼品，不断传入中国。如位于今越南中部(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带入沉香、琥珀、犀角等等药物。

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庵摩勒、毗黎勒、詹粮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芋香、桐木等。此外，越南的成药也有传入。《本草纲目》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膏，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因此，在中越医药交流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

四、中印医学交流

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医学交流。

公元629~645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传入我国的线索。如该书记叙：“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祀；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梵咒、医方。……”“病死：凡遭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大唐西域记》卷2)。

唐僧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已向印人介绍过中国的本草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奘的活动足以说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间的医药交流在唐代是很繁荣的。

隋唐时期也大量传入了印度医药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等。

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如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佛说咒禁经》，其中有用药物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香科制成的药丸并加咒语治疗“病”恐怖症；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重要部分。

途径。而佛经是随佛教而来，译述佛经者亦是高僧。因此，佛教在中印医学教流中亦起了促进作用。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七十八卷。王焘《外台秘要》中曾引用“天竺经论眼”，也说明印度眼科专著已引起当时中国医学家的重视。

隋唐时期，有不少印度产药物，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郁金香、龙脑香等等。

隋唐时期，印度医也有来华者，以眼科医为多。刘禹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刘禹锡《刘禹锡集》卷7，P51，四部丛刊缩编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就是印度眼医一例。此外有印度来华的僧侣，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及总章元年（668）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同（3）卷5）这些方士皆是兼识医药者。

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影响及当时中国的医学，因而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医药著作中，印度医药“大”说，均有述及。如《千金要方》中曰：“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备急千金要方》卷1，P3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外台秘要》则曰：“身者，四大所成，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上地大也……”（王焘《外台秘要》，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除理论外，医方、医法也有传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记述了十余个及天竺按摩法：《外台秘要》除载有“天竺经论眼”外，还有转引之“近效莲子草膏”（《外台秘要》，卷31，P85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千金翼方》中的咒禁内容及隋唐咒禁科也受印度佛教医学之影响。

五、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学交流

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了伊斯兰教国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中国与大食的交往甚盛。元615~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37次之多。其使携带来献的方物中包括有药物，《宋史》也记曰：“唐朝永徽以后屡次入朝而献方物。”据《本草纲目》记载来自大食之药物有：马脑、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等。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之称呼。载之大食国产药物，当多系隋唐时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阿拉伯。如生活于相当宋兴之世的誉为“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980~1037）的著作《医典》中就有受中医学影响的迹象，如《医典》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等。因而，《医典》也是隋唐时期中阿医药交流的反映。

古比波斯，即今之伊朗，在整个唐代都有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公元647~762年间，波斯使节来华达28次之多，不少使节携有香料、药物等。

如公元730年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牛等，中国本草中还记载有密陀僧、绿盐、阿石子、阿魏等波斯传入药物，可见波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药学的内容。不少中国化了的波斯人及阿拉伯人对中医学作了重要贡献，如唐末五代著名诗人兼药学家李珣，传为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其家以经营海药为业，有丰富的海药知识。他撰有《海药本草》，基本上是一部总结和记述波斯等海外传入中国药物的著作。

与此同时，我国也有许多药物向阿拉伯国家输出。如肉桂、芦荟、樟脑、生姜等。《通志》载：“依宾库达道记”载中国。出口货有戈菜伯、吉纳胶、芦荟、樟脑……肉桂、生姜等”。

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在今之东南亚有诃陵、堕婆登、狮子国等古国，与我国的交往也很密切。诃陵，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元和八年，道使献……频加鸟并异香；”“十三年十一月，献……犀等”。此外还有诃陵商人传入的医方。据苏颂《图经本草》记载：“破故纸，今人多以胡桃合于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迄今为临床常用之温经散。堕婆登国在诃陵国之西（当亦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贞观二十一年，其王献古贝、象牙、白胡椒等物。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古国如吐火罗、罽宾、个失密、泥婆罗等国，在隋唐时期与中国的往来

着相互的贸易往来，医药上也得到交流。如：

吐火罗国（古之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曾多次遣使进贡。“开元八年。献……异药。至使献胡药乾陀罗等二百余品。……十八年。巡使献红颇梨、碧颇利、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药”

罽宾（为西域古国名）、指今阿富汗东北一带地方及克什米尔一带。唐代称个失密，或作迦克什米尔的古译，据史书记载罽宾与中国的交流有：“贞观十六年，遣使献耨特鼠，喙光而尾赤有破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等物”。个失密“开元初遣使来朝。八年……献胡药”。

泥婆罗国，指今尼泊尔，“（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菱菜、浑提葱”。此二者皆为药物。在隋唐时期史书中所记载的与之有医药交流的国家尚有昆仑、拂懔等。

昆仑，我国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同时，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为昆仑。讲，昆仑亦包括了今部分非洲国家。唐本草中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骨丁香、檀香、阿魏、苏方木、白檀香等。

拂懔，又作拂临、拂林、拂菻即汉之大秦。隋唐时所谓拂菻即东罗马帝国。

据《新唐书》记载，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欧阳修《新唐书》卷 211 下，P10 局，1975 年），是穿颅术从国外传入中国之记录，《旧唐书》则载有“乾封二年(667 年)迫使南说明七世纪中期，底也迦已从拂菻传入，而在显庆二至四年(657~659)编写的《新修本草》中已有记载，曰“出西戎”，则也是一个旁证。底野迦是由许多种药物制成的，其中含有鸦片。提制为罌粟，也是从唐代才为唐医家陈藏器以“罌子粟”为名收入他的本草著作《本草拾遗》中。